

难忘在卡翁达家里做客

张西南



一排左二为卡翁达先生，二排左二为代表团团长、原兰州军区司令员王国生同志，左一为代表团成员、原南京军区副参谋长陈卫国同志，左四为代表团翻译、原总参外办参谋刘迪同志，左五为本文作者。

我有幸两次访问非洲。

2002年的8、9月间，第一次随我军新闻代表团访问埃及、苏丹、坦桑尼亚和南非，团长是时任原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的吴昌德同志。那次从北至南穿越非洲大陆，感受最深的就是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尤其在坦桑尼亚，走到哪儿都能听到人们讲坦赞铁路，无不怀念和赞扬为修建这条“友谊之路”“自由之路”“解放之路”倾注了巨大心血的毛泽东主席、尼雷尔总统和还健在的卡翁达总统，当时我还异想天开，什么时候能去赞比亚见到卡翁达就好了！

谁会想到，10年后，我有幸随我军军事代表团第二次踏上了非洲大陆，访问埃塞俄比亚、赞比亚和南非，团长是时任原兰州军区司令员王国生同志。虽不像头一回访非那么激动，但这一次却让我有惊喜，因为在卢萨卡见到了赞比亚前总统卡翁达先生。

2012年5月16日，当夕阳照在卡里巴湖水面上时，我们乘坐的埃航ET873次航班降落在卢萨卡国际机场。到酒店换上军装就前往赞比亚国防部参加欢迎仪式，随后前往赞比亚国防部总医院，看望由原南京军区81、359和454三所医院医务人员组成的我军援赞第15批医疗队。

次日一早，前往赞比亚陆军司令部举行正式会谈，下午赶到陆军第64装甲团参观。陪同我们的赞比亚陆军总司令指着训练场上停放整齐的22辆T59式坦克对王司令说，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中国朋友帮助我们建立了属于赞比亚的装甲兵，我们更希望中国朋友给予赞比亚陆军更多的支持！在极为友好的气氛中，王国生司令员作了热情而又积极的回应。

回到酒店，夜幕已完全落下了。我们正准备参加赞比亚国防部举行的欢迎宴会，突然接到使馆通知，卡翁达先生正在从外地赶回卢萨卡的路上，老人邀请中国军事代表团今晚到他家做客。与此同时，赞比亚军方也得知这个消息，先期到达酒店的官员与我使馆武官何志坚同志商议，原定的晚宴不变，时间可以顺延，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在这个美好的夜晚表达赞比亚军队对中国同行们的欢迎之情。

卡翁达先生的家是在卢萨卡市郊的一个宽敞的院子里，我们赶到时受到了他家人的热情欢迎。他们略带一点歉意地对我们说，卡翁达今天是在距离首都400多公里之外的地方参加一个公务活动，现在还在回国的路上，不过卢萨卡已经不远了，要我们先到会客室坐下来品尝非洲的上等咖啡。王司令真诚地表达了对他们的谢意，坚持要在院子里迎接卡翁达先生的归来。

此时，我仔细地环顾四周，这是一座朴素的院落，几乎没有装饰的平房就如我们在其他地方见过的那些普通民居一样，加上白色的围墙和攀爬在上面的绿藤，都被灯光映衬得洁净幽雅。院子里长着好几株被称为赞比亚

国树的合欢树，茂密的枝叶在月光的照射下将婆婆的树影撒满了院落。墙角的灌木丛盛开着各色的花儿，微风拂过便有清香扑鼻，使人感到卢萨卡5月的这个夜晚十分的惬意。

当卡翁达先生乘坐的轿车开进院子里时，车轮尚未完全停稳，老人家就打开车门下来了，双脚站定后在车旁稍停顿了一小会儿，然后双脚轮流用力踩地，这个动作让大家略感突然。我猜想，可能是因为长途乘车的缘故，让这位年迈的老人双脚有些发麻，不得不在下车后伸展一下腿脚，以改善下肢的血液循环。看见老人家切实站稳当了，陪伴他一路的女儿已从另一扇车门走过来扶住了老人，然后把身体转向我们，伸出手来向客人们打招呼。我们赶紧围拢过去，卡翁达上身穿着一件白底蓝花的长袖衬衫，脸上洋溢着开朗活泼的笑容，与他两道炯炯有神的目光相映成趣，将这位非洲独立运动的领袖老当益壮、坚毅乐观的性格衬托得十分鲜明。老人家与我们代表团的每一个人握手时，都用他那双宽厚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使劲儿地上下摇晃，让我们不仅感受到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真挚的情谊，而且还感受到这位耄耋老人身上蕴含着生机与活力，深深地触动了在场的每一位中国同志的心。

在我们的簇拥下，卡翁达总统与王司令手拉着手向屋里走去。没走几步，老人家转身对他非常熟悉的何武官说了一通话，然后沿着脚下的路，拐弯从另一条小路跑向近处的一间房子里去了。如果不是亲眼看见则很难相信，这就是那位饱经沧桑年近九旬的赞比亚“国父”吗？不会儿，走廊里就传来了卡翁达先生走路的声音，当他快到会客室门口的时候，老人家又开始溜一小跑，王司令带着我们

起立鼓掌。这时我发现，卡翁达先生下车时穿着的那件白底蓝花的长袖衬衫外面又加了一件熨烫平整的黑色外套，我估摸着他是考虑会见来自中国的朋友，希望自己的着装也要正式一些，不由得让我对老人家又平添了几分敬重。

宾主双方在会客室坐下来后，卡翁达先生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马上向我们表达了他对中国领袖的怀念和感激之情，并对我们代表团一天多来在赞比亚军营马不停蹄地参观访问表示出极大的赞赏。因为职业习惯，再得益于有翻译的间隔时间，我在现场对卡翁达先生的讲话做了较为细致的笔记，现抄录如下：

今晚我们的会见比原定时间晚了一些，不是因为有比与中国朋友见面更重要的事给耽误了，而是因为正在外地与一家中国企业商谈在赞比亚发展的事情，你们都是我的朋友，为中国朋友助力，与中国朋友见面，一直都是我乐意做的并为此感到高兴。尤其是在我家里见到中国朋友，就让我觉得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每当见到中国朋友，我都会有一种感觉，都会想起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他们两位不仅是我们赞比亚人民的好朋友，也是整个非洲人民的好朋友，一直令我非常崇敬。他们离开我们已经36年了，但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们，经常会想起与他们相见的情景，非常怀念在他们的全力支持和帮助下我们修建坦赞铁路的那些激动人心的岁月，赞比亚人民还有坦桑尼亚人民，相信都会和我一样，永远怀念毛主席和周总理。如今的世界与那个时候相比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在变，变得更加强大，赞比亚也在变，变得更加美好。但无论这个世界怎么变，我们两国领导人和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情谊始终没有改变。半年前，我作为赞比亚萨塔总统的特使访华，在人民大会堂和习近平副主席进行了友好会谈。至今我还记得，他说我是中赞友谊和中非友谊的奠基人，为中赞、中非关系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我对他说，我们建交47年来，两国一直都是全天候的朋友，这主

要得益于包括副主席先生在内的新一届中国领导人继续坚持毛主席和周总理制定的对非、对赞友好方针，不断拓展深化我们的传统友谊和友好合作。习近平先生又对我说，中赞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共同缔造的中赞全天候友谊，在中非关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广泛影响，他本人十分珍视中赞传统友谊，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赞关系。我把在北京访问的成果带回了赞比亚，我虽然现在不是总统了，但我做赞中两国的友好使者却没有期限，我要一直回去去并会不遗余力。今晚我从外地赶回来与诸位见面就证明了这一点，我始终坚信赞中两国的传统友谊会地久天长，未来会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王司令在和我们等候卡翁达先生时就商量，老人家毕竟年迈，又一路鞍马劳顿，我们尽量节省一点时间，让老人家早一点休息。王司令以极简短又真诚的讲话表达了我们对卡翁达先生的崇敬之情、感激之情和祝福之情，然后将我们带来的一个非常精美又具有中国特色的青花瓷笔筒送给卡翁达先生留作纪念。老人家把这件小礼物捧在手上仔细观看上面的图案，显得非常的喜爱和兴奋。他对王司令说，我要送给中国朋友的礼物，是我自己创作的一首歌，叫《团结一心》，这也是我心中的歌，我现在就唱给你们听，希望能够表达出我对中国人民最真诚的感情。

夜已深了，月亮也升起来，透过暗红色的木质窗戶投进来一束皎洁的月光，会客室的白墙映衬着卡翁达先生和蔼可亲、笑容可掬的脸庞，他饱含真情的演唱深深地打动了我们代表团的每一个人，我目不转睛地一直看着他，发现老人家的眼眶里慢慢渗出晶莹的泪光。

转瞬就过去了9年，卡翁达先生也于不久前离开了我们。但在他家做客的情景和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恍若眼前，那曲《团结一心》声情并茂的歌声也仿佛还在我的耳边回旋，心中又涌起对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不尽的怀念。

（本文作者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原第二炮兵政治部副主任）

乎寻常的情况，但是都落空的。我是多么希望看到咱们的地方武装突然到来啊！我的心情就如初上战场的新战士，紧张得不可名状。大桥接近藁城，到了大桥的南头，这里设有一个检查行人的警察所，我决定在这里下手。

我说要下车去解手，从腰里拔出剪刀握在了手里。敌人叫车停下，当时青原一夫面朝西坐着，我半立起来，趁其不备，左手打掉了他带的礼帽，死死地按住了狗头，右手举起剪刀，向他的面部、喉头猛刺下去……这个鬼子哇地连命哭喊，两手乱抓，致使我的剪刀没能命中他的要害。

桥头站岗的伪警察，急急地跑过来，抱住了我的双臂，这下我动弹不得了。随后又窜来了两个特务，劈手要抓我的剪刀。剪刀既然无法落在敌人的头上，我就调转剪刀，向自己的喉部猛刺，心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坚决不当俘虏！可惜剪刀只扎在自己脖子以下，没能致命，第二剪刀扎下时，我已两个特务扯到了车下，夺走了剪刀。此时我已无力抵抗，被他们五花大绑地捆绑起来了。脖子上的血直往下滴。青原一夫趴在车前辕上，头上脸上尽是血污，特务们端着枪咋咋呼呼的乱喊：“这个女人真厉害！”

我昂首阔步地在前头走，对这些鬼子好汉破口大骂，特务们有的用枪托在我脊梁上捣，有的用皮带抽。他们打得越狠，我骂声越高。这座大桥是藁城无极到石家庄的咽喉要道，行人很多。老百姓目睹我披头散发，满脸是血，在敌人面前虽受毒打但是毫不绝口，人们虽然不敢停步，却都向我投以赞许和钦佩的目光。

我用剪刀刺伤青原一夫的消息，像生了翅膀一样传遍了藁南地区。县委把我定为民族英雄大力宣传，大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冀中导报》也发表了消息，有的还编写了剧本《血染滹沱河》。

鲁迅也遇出书难

邹时氏



鲁迅一生著述颇丰，生前共出版作品近30部。然而，即使是身为中国现代文坛大家的鲁迅，也碰到过因经费不足而无法出版书籍的事情。

《古小说钩沉》是鲁迅耗时最久、投入精力最多的一部作品，其编辑工作在鲁迅17岁离开故乡绍兴之前就着手准备。1913年春，《古小说钩沉》辑本基本完成，鲁迅为它写的序言发表在当年2月出版的《越社丛刊》第一集上。但是，由于经费等原因，这部作品却没能出版。直到1938年，鲁迅逝世两周年之后，二十卷本《鲁迅全集》出版时，才收入了《古小说钩沉》。

书出版后的销售也是一件难事，为此，打广告成了一种销售方式，鲁迅也曾为出书做过广告。《死灵魂》是俄国大文豪果戈理的名作，在世界

文坛具有广泛的影响。关于《死灵魂》的有名的图画，据里斯柯夫说，一共有三种，而最正确和完备的是阿庚的百图。1936年7月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的《死灵魂百图》由鲁迅出资。他在为出版的《死灵魂百图》写的广告中说：“果戈理时代的俄国中流社会情状，历历如在目前，介绍名作兼及如此多数的插图，在中国实为空前之举。但只印一千本，且难再版，主意非在贸利，定价竭力从廉。精装本所用纸张极佳，故贵至一倍，且只有一百五十本发售……定购似乎尤为从速也。”

实际上，为了这本书的出版，鲁迅是自己斥资“倒贴”的。书本价格贵，并非为了盈利，而是出版成本高，其广告“推销”实属公益性，因为鲁迅是要让更多中国读者读到世界文学名著才推出此举。



于右任学写字

姚秦川

于右任原名伯循，字诱人，之后以“诱人”的谐音“右任”为名，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和书法家，其书法潇洒飘逸，自成一体。于右任在书法上面取得的成功，缘于他与众不同的学习方法。

年轻时，于右任主要致力于魏碑书法的研习，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在他过42岁生日那天，于右任却突然向身边的亲朋宣布，自己从当天起，开始学习草书。

大家听了，都对他的决定表示反对：“人常说人生三十不学艺，现在你已经过了不惑的年龄，学习起来肯定费劲吃力。”更有一个懂书法的朋友给予右任分析道：“草书和楷书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先不说草书不好认，它们更不好写。如果想要写好草书，必须先要记准草书的写法，这对任何一个学习草书的人来说，都是一

个很大的困难和挑战。”

于右任听完大家七嘴八舌的劝告后，先是对大家的好意表示感谢，随后一本正经地说道：“学写草书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不过我想出了一个看似不切实际但却实用的笨办法，我打算每天只记一个字的草书写法，这样下来，一年就可以记住365个字。我坚信长久坚持下去，滴水一定能穿石。”

从第二天起，于右任便开始了每天只学一个字的习字方法。偶尔，哪一天因为别的事情耽误了学习，他也会在第二天将前一天没有学的字补上。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坚持，于右任最终成为了20世纪最重要的书法家之一，世人更是尊称他为“草圣”。

对于学习草书，于右任有一句名言：“我们学习草书，如不能成为‘草圣’，也应成为‘草贤’，千万不要成为‘草包’。”



梁实秋打抱不平

沈治鹏

梁实秋出身旧式官僚家庭，从小受书香之气的熏陶，保守、温和、传统的色调贯穿他的一生。当然，梁实秋正值青春勃发的时候，受到五四精神的影响，他并没有躲在书房里，而是兴奋地呼吸着新文学运动的时代气息，加入新时代的行列。

1915年，梁实秋以天津第一名成绩考入清华学堂，开始了8年的清华求学生涯。1921年，他与顾毓琇等组织“小说研究会”，后改为“清华文学社”，闻一多、朱湘、孙大雨等为社员。不久，他又参与《清华周刊》编辑工作，并成为《文艺增刊》主编，其文学批评初露锋芒。翌年，与闻一多合著《冬夜草儿评论》。

梁实秋从来都是品学兼优的学

生，但有一次却遭到国文老师徐澄澄的痛骂。当时，徐澄澄多喝了两杯，摇摇晃晃走进教室，慢悠悠在黑板上写作文。有个性急的学生才见两个字，就急了：“这题目怎么讲？”徐澄澄勃然大怒，滔滔不绝地吼个不停。梁实秋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站起身来替同学分辩了几句。

这下惹毛了这位前清举人，竟破口骂道：“梁实秋，你是什么东西，我一眼把你看到底！”以梁实秋的辩才，他回几句绝不是什么难事，但他知道不应该与师长顶撞，就低头不语了。这位生酒醒后，知道自己失态。从此，他给梁实秋改作文时特别认真，使梁实秋在写作上受益匪浅。梁实秋打抱不平的行为得到了同窗好评，哪知同时还得到了先生的青睐。



姚雪垠的坦荡

包广杰

姚雪垠在抗战期间创作了短篇小说《红灯笼的故事》，这篇小说还被同时的鬼子翻译成了俄文，收录在《中国短篇小说选》中，后又翻译成英文，大大鼓舞了反法西斯人民的信心。然而，如果姚雪垠本人不说明，恐怕很多读者并不知道这篇小说的雏形是谁提供的。

故事还要从西安事变爆发后开始讲起。1936年年底，年轻的共产党员赵伊坪接受了组织安排——放下教鞭，去做“唤醒”士兵的工作。此时，他正在河南开封县的大同学校任教，他要奔赴山东，去开展统战工作。出发的前一夜，一群进步教师和学生秘密地为他举行了欢送会。深夜，欢送会将要结束时，赵伊坪给在场的人讲了一个寓意深刻的“红灯笼”的故事，在场的姚雪垠深受感动和启发，后来，他据此创作了短篇小说《红灯笼的故事》。

小说是姚雪垠在赵伊坪讲述的基础上进行了二度创作才得以完成的，但他没有把功劳据为己有，相反，姚

雪垠多次讲述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其中在《关于赵伊坪》一文中，他这样回忆了当时的情形以及这个故事对他创作小说的影响：

伊坪在会上讲了一个很感人、很有诗意的故事，象征党在向他召唤，祖国在召唤。抗战期间，我在他的故事基础上进行加工，对青年学生讲过多次，又写成一篇《红灯笼的故事》。这个故事由苏联人译为俄文，同我的《差半车麦秸》收集在莫斯科出版的《中国短篇小说选》中。许多人都知道我的《红灯笼的故事》，而不知道它的雏形是伊坪创作的。

姚雪垠在1987年11月为其书系第十一卷写的前言中，谈到《红灯笼的故事》时有这样一段论述：“按照一般道理来讲，这已经是一个相当有名的故事，可以不修改了……”但姚雪垠在这次修改时，直接把赵伊坪的名字和当时的情景写入正文中，这在作为小说的文字作品中也是不多见的。

血染滹沱河

丁冷

我的姨姨丁冷是河北冀城的英雄人物。她的一生充满了昂扬的斗志和大无畏的精神，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她垂头丧气、牢骚满腹、郁郁寡欢的时候。如果说“革命人永远是青年”的话，她做到了。

1937年平北平北平平北平，奔向华北广大地区。姨姨在1939年上了太行山，改名丁冷，参加了八路军，编制隶属129师。1940年，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期间，经连队指导员朱赤茜（原名郝志平，系罗瑞卿同志的爱人）和连长程克同志介绍，姨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日子里，我把《丁冷回忆录》摘编出来，通过了解丁冷的事迹，来缅怀那些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贡献一切的优秀共产党员。

——孙燕华

（孙燕华系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李燕夫人，现任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理事。）

1944年初，阴历二月十一，我到藁南敌人大据点梅花镇开展工作，被敌人特务侦察到了，以骗我到警察所“接城里来的电话”为由，把我秘密逮捕了。

敌人监视我回藁北的大据点张家庄。张家庄驻守着敌人的警备大队的部队，队长名叫周操。还驻扎了一个日本特务小队，隶属驻无极县的赖谷特务队，小队长青原一夫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自被捕后，全家人惊恐万分，嫂子混在探望的人群里见到了我，悄悄地说，青原一夫逮捕我是打算跟我结婚。我一听怒火升起，想打我的坏主意，没门！第二天深夜，我突然被特务叫起来，施展劝降伎俩，说：“只要你和青原一夫要好，其实你做什么事都可以！”

我愤愤地说：“你是说话还是放屁呢？你不是中国人？不嫌辱没祖先？！”特务“喇”地一下子从腰里拔出手枪，“啪”地一声摔在方桌上，震得方桌上的尘土飞扬起来。大声吼叫：“你不怕死？”

“我既然被你们捉来就没有打算活着出去，是死是活你们看着办吧！”特务一手拧着我一只胳膊，一手端着枪，把我送到了日本特务青原一夫的住处。青原一夫说：“我一见你便钟情，你一定要答应我的要求。”我正在思谋着对付敌人的办法，敌人又卑鄙地说：“我是很重视感情的……”他认为我软弱可欺，一跃过来将我按倒在炕上，嘴里还嚷着：“答应我吧！答应我吧！”

趁其不备，我用双手拼命地卡住了他的脖子。他双手只顾去掰我的手，身子便滚倒了。我乘机大声呼喊，他愤